



照亮角落的温暖光芒

——读《角落的人》

彭忠富/文

在这个崇尚速度与宏大的时代，我们习惯了仰望摩天大楼的轮廓，追逐流光溢彩的繁华，却常常忽略那些构成城市真实肌理的“角落”。出版人、人气绘画博主熬路的作品《角落的人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），正是一次投向这些被遗忘空间的深情凝视。本书图文并茂，收录七张写生地图，所记录的故事均源于真实见闻，入画的场景也都客观存在。这不只是一本城市观察随笔，更是一场引导读者重新发现“附近”、找回生活诗意的生动实践。

什么是角落？在熬路笔下，角落是高楼大厦的缝隙，是老街巷陌的转角，是路边的西瓜摊、村口的小卖部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，实则是城市记忆的储藏室，是生活本真的呈现地。在《葫芦村》一章中，作者带我们走进那个三面临湖的小渔村，红瓦房、藕塘、橘子树、修补渔网的老人……每一处场景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与人情的温度。

特别打动人的是那个被妈妈罚站门口的“寸头小男孩”。作者本想画下这个“精彩又生动的人物造型”，却“考虑再三决定给他留个面子”，最终合拢画本悄悄离开。这份克制的尊重，让艺术创作回归对人的关怀，也使角落里的生命获得了应有的尊严。而从画本中认出自家房子、热情捧出香瓜的大姐，以及拒绝收费、慷慨赠送嫩莲藕的藕塘主人，他们与画者的真诚互动，构成了作品最动人的部分。艺术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成为连接人与人、人与地方的桥梁。

熬路的创作，是水彩、散文与实景

的独特融合。他不仅用画笔记录光影，更用文字捕捉心境，形成一种立体的叙事。在《绿色的处理》中，他谈及观摩恽寿平原作后获得的启发，将传统没骨画法融入对村落“红配绿”景象的表现。这并非简单的技法移植，而是古今艺术精神的隔空呼应，展现出创作者在传承中的自觉创新。更值得品味的是，熬路将绘画过程本身变为一场与时间的博弈。在《和树荫赛跑》中，他追随树荫一步步挪动，直至“全身沐浴在40℃的阳光中”。这般执着近乎仪式，却恰恰体现出艺术创作最本真的状态——在与自然的直接对话中捕捉真实。而在《俯视》一节，他从坡地远眺自己曾经写生的位置，恍然意识到“当年的自己只是一个被老师放过的‘青铜’”。这种视角的转换，不仅是空间的，也是心理的，让作者与读者共同领略“跳出来看一件事”的智慧。

《角落的人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，在于它成功唤醒了潜藏于我们心底的集体记忆。那些关于蓬蓬、西瓜的童年往事，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通往岁月的情感通道。《蓬蓬的记忆》中，爹爹让“我”将略带苦味的莲子芯丢入茶杯“清火”，而那些被叫作“虾子”的空心莲子，被孩子们在脑门上磕出清脆响声。《西瓜的记忆》里，没有冰箱的年代，半个西瓜浸在搪瓷脸盆中，上方罩着防蚊虫的纱罩。这些细腻的描述，唤醒的不仅是个体的怀旧情绪，更是一代人的共同经历。当熬路将郑渊洁的《十二生肖童话》等文化符号嵌入叙事，他实际上是在为这个时代构建一份生动的民间记忆档案。

两字一哲思 烟火见通透

——读《我能把生活过得很好》

王玉美/文

当梁实秋在《我能把生活过得很好》中，以《送礼》《排队》《讲价》这类两字标题拆解日常时，我们蓦然发现：那些被我们视为“俗常”的生活片段，恰是人生哲学最接地气的教案。这本书不灌输大道理，却以幽默入骨的笔触，在“送礼要懂人心”“排队可见本性”等洞察中，搭建出一套“把生活过好”的实践指南——让读者在梁实秋的两字智慧里，寻得将日子过得成诗的法门。

《送礼》一章，梁实秋将中国人的“礼尚往来”写得通透。他写送礼者“挖空心思选礼物”，收礼者“半推半就接心意”，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人情往来的微妙劲道。他不作褒贬，只淡然道出“送礼是情的载体，送对了是默契，送错了是乌龙”。这般“清醒旁观”，正是通透生活的起点——当我们不再执着于“送礼必求回报”的功利，转而享受其中的人情互动，送礼便从负担变为生活的调味剂。正如他写自己收到一本旧书，“虽不昂贵，却因送书人知我嗜读，便觉情谊千斤”，这份对“礼轻情意重”的拿捏，让人情往来有了温度。

《排队》如同一幅鲜活的市井速写。梁实秋笔下的医院挂号队伍“像条没精神的龙”，超市结账队伍是“无声的拉锯战”，继而笔锋一转：“排队最磨耐心，也最露本性。”他并不居高临下指责插队者，反以调侃语气说“插队的人大概是觉得自己时间比别人金贵些”。这般带着理解的幽默，使“排队”不再是枯燥的等待，而成为观察人性的舞台。当我们在排队的焦躁中读出“大家都不容易”的共情，便在这日常“煎熬”里练就了处世的豁达——正如梁实秋自己，在排队时观察旁人神态，“竟也看出些趣味，时间便没那么难熬了”。

《讲价》将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升华为生活智慧的博弈。梁实秋写小贩“喊价如唱曲”，顾客“还价如谈判”，把买卖双方心理战写得妙趣横生。而他更深一层的洞察在于：“讲价不为占便宜，是为掌握生活的主动权。”在他笔下，讲价成为“一场关于尊重与底线的无声对话”：小贩要营生，顾客求实惠，最终成交价是双方对生活的相互成全。这种解读让人顿悟：生活中的“锱铢必较”未必是小气，有时恰是对自身生活的清醒把握——正如他所传授的“讲价妙招”：“先显兴趣，再挑小瑕，最后报出合理价，彼此舒坦。”

《代沟》中，梁实秋对“代际差异”的解读充满温情。他写“父辈嫌我们新潮，我们嫌父辈老派”，却又指出“代沟不是鸿沟，是时间在两代人身上刻下的不同印记”。他既不主张晚辈一味顺从，也不赞成长辈强求复制，而是提出“代沟需要理解，而非征服”。这份通透，使“代沟”从矛盾源头转化为代际交流的契机——正如他写自己与子女聊流行歌，“虽听不懂歌词，却爱看他们谈论时眼里的光”。对差异的包容，正是“把生活过好”的核心能力：承认不同，欣赏不同，在代际两岸搭起理解之桥。

《中年》是梁实秋对人生阶段的温情回望。他写“中年是人生的三岔口，前看青春远去，后望暮年将近”，又以自嘲口吻说“中年人的保温杯里，泡的不是枸杞，是对生活的妥协与热爱”。他不美化中年的压力，也不哀叹其疲惫，而是坦然道出“中年最可贵是清醒——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”。这份清醒让我们懂得：把生活过好，不是逃避年龄增长，而是在每一阶段都寻得属于自己的价值——正如梁实秋的中年，“仍能在读书写字中得趣，于家人闲坐时感受温暖”，这般从容，正是岁月馈赠的生活智慧。

合卷细品，《我能把生活过得很好》中所说的“好”，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精神的通透。梁实秋以一个个两字标题为钥匙，开启生活琐碎中的哲学宝藏：送礼见人情，排队观人性，讲价品智慧，代沟悟理解，中年识真味……在他笔下，没有什么生活难题不能用幽默化解，没有什么人生困境不能用通透超越。

这本书最动人之处，是让我们领悟：把生活过好，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，只需在“送礼”时多一分真诚，“排队”时多一分耐心，“讲价”时多一分体谅，“面对代沟”时多一分包容，“身处中年”时多一分清醒。梁实秋用他的“两字智慧”，为我们织就一张生活的滤网——滤去烟火气中的浮躁，留下通透者的自在。当我们能在日常百态中悟得这份智慧，便真正掌握了把生活过好的心法。

《川菜东征记》：一部川菜如何征服中国的信史

聂难/文

翻开周松芳的《川菜东征记》，上世纪川菜跨越山川、自巴蜀走向全国的历程，便在扎实的史料铺陈中徐徐展开。这部饮食史著作跳出单纯谈“味”的范畴，以治史的严谨态度，广搜私人日记、旧报杂志、档案文献等，将川菜“东征”的每一步都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。它不仅讲述了川菜馆在武汉、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落地生根，更勾勒出一道饮食与文化交织的轨迹——让我们在品味川菜传奇的同时，读懂一道菜系如何突破地域局限，逐渐融入国人日常，成为承载时代记忆的“标准国菜”。

以史料为骨架，是《川菜东征记》的鲜明特色。周松芳将川菜扩张的每一个细节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。在叙述川菜进入上海的过程中，他援引旧报所载“利男居”“蜀映”等川菜馆的广告，从其开业时间、招牌菜品到定价策略，还原了川菜在沪上的最初面貌；谈及北京川菜馆的兴起，则借助文人的私人日记，呈现鲁迅、梁实秋等名家在“厚德福”用餐的感受；探讨武汉川菜馆的发展，又从地方档

案中梳理出其与当地商会、市民生活的关联，展现川菜从“外来菜系”到“日常选择”的转变。这些散落的史料，在作者笔下如拼图般渐次完整，使川菜的“东征”成为有段时间、有地点、有细节的可信历史。

书中对川菜“东征”地域轨迹的描摹，亦充满生动的城市烟火气。作者结合不同城市的特质，呈现川菜馆的差异化发展与融入路径。在上海，为适应江南食客，川菜馆适当降低麻辣程度，推出“糟熘鱼片”“鸡豆花”等温和菜品；在北京，川菜馆与文人文化深度绑定，“厚德福”等名店不仅是宴饮场所，更成为文人雅集的空间；在武汉，凭借九省通衢之利，川菜馆成为南来北往客商的聚集地；在广州，川菜馆以鲜明麻辣风味在粤菜天地中开辟一席。每一座城市的川菜馆，都带着当地的文化印记，成为城市生活的生动切片。

更深刻的是，《川菜东征记》透过饮食流变，揭示出文化交融的深层逻辑。川菜能突破地域限制成为“标准国菜”，不仅因其味觉魅力，更在于其主动适应不同地域文化语境，同时不失本味特质。书中

细节尤为动人：上海川菜馆的厨师向本地师傅学习食材处理，使川味与江南食材碰撞出新风味；北京川菜馆邀请文人题写匾额，为饮食空间添染文雅气质；武汉川菜馆于节庆时推出融汇楚菜元素的“川楚合璧”宴席，拉近与本地食客的距离。这种“主动融入而不失本味”的智慧，正是川菜跨越地域、深入人心的关键。而川菜馆在各地的兴起，也反向影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与市民生活——它使“麻辣”为更多人所接受，使川菜技艺融入地方烹饪体系，更让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共享川味的过程中，实现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共鸣。

《川菜东征记》以川菜为窗，展现了上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——从饮食的流动中，可见城市间的经济往来、文化交流与人口迁徙；从川菜馆的兴衰中，可读出市民生活的变化与时代潮流的演进。周松芳以严谨的史笔与生动的叙述，让饮食史兼具学术深度与生活温度。合上书卷，再品川菜时，或许多出一重对历史的敬畏——那盘麻辣豆腐中蕴藏的，不仅是川味的精髓，更是川菜跨越山海、融入万家传奇，是一段饮食与文化交织的动人故事。

《两京十五日》：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绝境求生

孤舟/文

翻开马伯庸的《两京十五日》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近乎窒息的紧张感。洪熙元年五月，南京城外的秦淮河上，太子朱瞻基所乘宝船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碎片。这位从火海侥幸逃生的储君，转眼从万众景仰的皇位继承人沦为全城追索的亡命之徒。而远在北京的皇宫中，洪熙皇帝突然病危，一场围绕皇位的阴谋正悄然展开。留给朱瞻基的时间，只有十五天。

马伯庸作为以“考据型悬疑”著称的作家，再次展现出填注历史缝隙的想象力。他虽毕业于新西兰高校，曾任职外企，却以《风起陇西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等作品在文坛独树一帜，擅长在真实历史的骨架上构建血肉丰满的故事。《两京十五日》亦是如此——史书中关于朱瞻基自南京返京继位的记载仅寥寥数笔，在他笔下却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。

太子朱瞻基的形象打破了古代皇储的刻板印象。他不是高高在上、养尊处优的储君，而是被命运逼入绝境的普通人。当他被迫脱下龙袍、剃去头发、伪装成戴枷的囚徒时，那种从云端跌入尘埃的落差令人窒息。看他与市井捕快吴定缘、芝麻小官于谦、女医师苏荆溪这三个看似不相干的“小人物”结伴逃亡，不禁引人思考：剥离身份与地位的外衣，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何在？

吴定缘这一角色尤为耐人寻味。这个被全南京城耻笑为“蔑篙子”的酗酒捕

快，表面自甘堕落，却在危难时刻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与行动力。当太子惋惜放走的蟋蟀“离了罐子也无路可走”时，吴定缘冷言相讥：“你离了罐子又能如何？外头还是重重牢笼。”这句话看似说虫，实是喻人，道破了太子身处权力牢笼的困境。在这个颓废的灵魂深处，藏着何等清醒的痛苦。他与太子之间既厌恶又依赖的复杂关系，构成小说最迷人的人物张力。

而于谦——历史上二十年后将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澜的忠臣——此时还是个满腔热血的小官。他那句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怒吼，不仅震醒绝望中的太子，也道出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。在这个小人物身上，我们看见超越个人得失的担当，是对天下苍生的责任，对正义公道的坚守。

女医师苏荆溪的加入，则让逃亡团队更显完整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需被保护的弱女子，而是心怀复仇计划的独立个体。当她冷静解释如何以医理杀人于无形时，那份专业带来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。这一角色打破了古代女性在文学中的固有形象，展现出基于知识与智慧的强大力量。

马伯庸笔下的逃亡之路，也是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。从南京的秦淮风月到运河的漕运枢纽，从官场权斗到市井智慧，每一场专业带来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。这一角色打破了古代女性在文学中的固有形象，展现出基于知识与智慧的强大力量。马伯庸笔下的逃亡之路，也是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。从南京的秦淮风月到运河的漕运枢纽，从官场权斗到市井智慧，每一场专业带来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。这一角色打破了古代女性在文学中的固有形象，展现出基于知识与智慧的强大力量。

小说最引人入胜之处，在于贯穿始终的时间压迫感。十五日，从南京到北京，不仅要跨越千里山河，更需冲破人为的重重阻碍。每一章皆在倒计时，每一时辰皆关乎存亡。这般紧张节奏令人难以释卷，恍如亲身卷入这场与时间赛跑的亡命之旅。

但《两京十五日》不止于悬疑冒险。在紧张情节之下，马伯庸更深层权力与人性的复杂关系，当朱瞻基脱下华服，以常人一身身民间苦难，方真正领悟为君之道。这段逃亡实为一场成长之旅、一次灵魂的淬炼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几近偏执。从官制礼仪到市井俚语，从车船交通到饮食服饰，每一细节皆力求还原明时风貌。这般严谨赋予虚构故事以坚实的历史根基，亦深化读者的沉浸体验。掩卷沉思，不禁感叹：若无这场变故，朱瞻基或永为深宫太子，不识民间疾苦，不解信任与担当的真义。正是这场近乎毁灭的逃亡，令他脱胎换骨，终成史书中励精图治的宣德皇帝。

这或许是马伯庸意图传递的深意：命运所设的绝境，或许正是新生的起点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源于身份地位，而源于绝境中不弃的勇气，与黑暗中犹存的良知。

《两京十五日》不只是一部精彩的历史悬疑小说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对自我本质的追问：当一切外在标签剥落，我们究竟是谁？在命运的洪流中，又该如何守住所信、坚持所望？